

# 邓小平对中国特色国家治理道路的历史性贡献

梁东兴 马 博

**【摘要】** 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党带领人民经过不懈努力走出了一条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道路。作为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确立了探索中国特色国家治理道路的方法论原则,奠定了坚持中国特色国家治理道路的本土化模式,提出了推进中国特色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大要求,推动了重塑中国特色国家治理体系的探索性改革,为中国特色国家治理道路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关键词】** 邓小平;中国特色国家治理道路;治理现代化;中国特色国家治理体系

**【中图分类号】** D6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4527(2021)05-0096-08

**【作者简介】** 梁东兴(1977—),男,湖北随州人,武昌理工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法学博士,主要从事社会治理与公民道德研究;马博(1991—),女,河南南阳人,武昌理工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法学硕士,主要从事国家治理研究。

国家治理道路标定了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制度形态和路径选择,事关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实现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局。进入新时代以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改革目标,体现了我们党在治国理政理论上的重大创新。事实上“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sup>①</sup>,不断探索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制度和体制机制。新中国成立70余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党带领人民创造性地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道路。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质之一,就是“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sup>②</sup>。时至今日,中国特色国家治理道路的轮廓已清晰擘画,中国特色国家治理体系也日臻成熟和完善。作为“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创者”<sup>③</sup>,邓小平对探索和开辟中国特色国家治理道路作出了历史性贡献,不仅从理论上初步回答了“走出一条什么样的中国特色国家治理道路,如何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治理道路”这一基本问题,而且从实践上进行了有益探索、积累了宝贵经验,提出了希望在建党一百周年时“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sup>④</sup>的期许。当前,站在两个百年目标转换之际,系统梳理、总结和回顾邓小平关于中国特色国家治理道路的相关论述和实践探索,有利于我们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更好地赓续国家治理的中国道路和精神血脉,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

①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1年07月02日。

② 参见王怀超:《论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质》,载于《社会主义研究》2020年第6期。

③ 习近平:《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08月21日。

④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2页。

## 一、确立了探索中国特色国家治理道路的方法论原则

对中国共产党而言,开辟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国家治理道路是一项“马克思没有讲过,我们的前人没有做过,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干过”<sup>①</sup>的新事业。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高瞻远瞩,不仅郑重宣布和强调“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sup>②</sup>,还从如何指导认识、推动实践、促进发展等方面确立了探索中国特色国家治理道路的方法论原则。

### (一) 指导认识的方法论原则: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实事求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和根本要求,也是中国共产党一以贯之始终坚持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事求是,是邓小平同志一生最重要的思想特点,也永远是中国共产党人应该遵循的思想方法。”<sup>③</sup>实事求是内在地要求解放思想。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党领导人民在长期革命过程中形成的基本经验。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初步探索时期,由于偏离了这一正确路线,导致党和国家事业遭遇严重挫折。总结经验教训,邓小平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sup>④</sup>。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世界形势日新月异,新科技革命方兴未艾,新观念、新事物层出不穷。百业待举的中国想要赶超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实现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重新确立这一思想路线异常重要。邓小平强调,解放思想就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sup>⑤</sup>。它决不是闭门造车的主观想象,也不是脱离国情的异想天开,更不是毫无章法的莽撞蛮干,必须一切从实际出发,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和现实条件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体制机制和管理方式。在探索中国特色国家治理道路的进程中,邓小平在关键时刻作出的重大决策、提出的重要理论,无不体现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比如,打破思想僵化的束缚,认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sup>⑥</sup>,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计划和市场都要”<sup>⑦</sup>。再如,科学认识和把握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阶段以及我国所处的历史方位,明确提出“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sup>⑧</sup>,这是当前我国的最大实际,是我们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根本立足点、出发点等。

### (二) 推动实践的方法论原则:遵循规律,大胆改革

马克思主义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角度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而作为后发追赶型国家,在没有现成的经验可资借鉴、没有合适的模式可供照搬的情况下,要搭乘现代化的快车,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实际、顺应时代要求、满足人民需要、促进经济发展的国家治理道路,还必须在遵循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基本规律的基础上,大胆探索尝试,勇于改革创新。为此,邓小平提出:“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sup>⑨</sup>,“现在我们正在做的改革这件事是够大胆的。但是,如果我们不这样做,前进就困难了”<sup>⑩</sup>。他指出,马克思主义“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sup>⑪</sup>。我们搞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没有丢马克思,没有丢列宁,也没有丢毛泽东。老祖宗不能丢啊”<sup>⑫</sup>!当然,遵循规律,并不意味着照抄照搬,而是要在遵循科学规律的基础上大胆探索改革,勇于开拓创新。在探索和尝试的过程中,坚持胆子要大、步子要稳。改革是一场革命,“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sup>⑬</sup>。同时,改革又是一个大试验,“国家这么大,情况太复杂,改革不容易”<sup>⑭</sup>,必须科学决策,从中央到地方积极地、稳步地推进。改革开放后,我国始终遵循先易后难的务实改革路线,坚持由点到面扎实稳步推进,走出了一条从实际出发的渐进改革之路,在国家治理上取得重要突破和重大成就。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开拓创新,是邓小平同志一生最鲜明的领导风范,也永远是中国共产党人应该具有的历史担当。”<sup>⑮</sup>

①②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8、3、373、364、252、136、113、382、369、372、177页。

⑬⑮ 习近平:《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08月21日。

④⑤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3、279页。

### （三）促进发展的方法论原则：独立自主，科学借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发展成为党和国家一切生活的主题。邓小平客观分析我国社会的基本国情和主要矛盾，认真审视中国与世界的差距，强调“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是要靠自己的发展”<sup>①</sup>。“发展才是硬道理。”<sup>②</sup>解决温饱问题，使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解决国内各种问题，实现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振兴中华民族，提高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都离不开发展。那么，如何尽快实现发展呢？首要的，必须坚持独立自主。只有坚持独立自主，才能适合中国国情、彰显中国特色。邓小平强调“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sup>③</sup>。当然，独立自主并不等于闭关锁国，把自己孤立于世界之外，因为“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sup>④</sup>，“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sup>⑤</sup>，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创造的现代文明成果。资本主义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在经济、科技、教育等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积累了丰富经验。新中国成立后，虽然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上取得了重大成就，但是生产力总体水平仍然比较低，经济社会等各方面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较大差距。尤其是现代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更是拉大了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差距。在现代国家治理上，西方国家也比我们起步早。所以，必须在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大胆吸收和积极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来为我国现代化建设事业服务。同时，邓小平强调，“大胆吸收”并不意味着全盘吸收，而是吸收那些积极的、对我们有用的东西，取人之长，补我之短。这些东西吸收得越多、越广泛、越充分，对社会主义事业就越有利。而对那些消极腐朽的东西，必须坚决予以批判和抵制。<sup>⑥</sup>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积极学习、大胆借鉴人类文明一切优秀成果，使社会主义发展更加充满生机活力。

## 二、奠定了坚持中国特色国家治理道路的本土化模式

治理理论发轫于西方，但是治理的模式不止一种。“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根据我国传统、现实国情和长期治理经验，创造性地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创造了不同于历史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治理模式”<sup>⑦</sup>，初步建构起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众参与的协同治理格局。

### （一）根本特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仅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也是中国国情的现实要求，更是党自身优势的必然选择。近代以来，为了挽救民族危机，无数仁人志士进行了不懈探索和努力。但是，由于历史和自身的局限性最终都失败了。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广大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并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初步探索的巨大成就，实现了改天换地的伟大转变。总结历史经验，邓小平指出，“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现代中国的一切”<sup>⑧</sup>。从现实国情来看，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民族习俗、宗教文化、区域发展等差异较大，利益、观念等错综复杂，内有赶超西方发达国家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巨大压力，外有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和西方和平演变战略的巨大挑战，没有一个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是不行的。从党自身的优势看，“我们这个党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党……是无产阶级的、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觉悟的、有革命纪律的先进队伍”<sup>⑨</sup>，“不仅能够把全党的力量，而且能够把全国人民的力量集合起来，干出轰轰烈烈的事业”<sup>⑩</sup>。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在党的领导下稳步推进。坚持党的领导，才有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欣欣向荣的建设景象。削弱或动摇党的领导，只能导致社会动荡、国家分裂、民族衰落、人亡政息。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sup>⑪</sup>。

①②③④⑤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65、377、3、78、373页。

⑥ 参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7-168页。

⑦ 王文：《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中国智慧》，载于《红旗文稿》2020年第2期。

⑧⑨⑩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66、266、267页。

⑪ 习近平：《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载于《求是》2020年第14期。



## （二）实践特征：更好地发挥政府的职能

在我国，政府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执行者和人民群众利益的捍卫者，是国家治理的组织者和责任主体。过去，由于受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政府所承担的职能极不合理，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我们的各级领导机关，都管了很多不该管、管不好、管不了的事”<sup>①</sup>。政府机构庞大臃肿、职能配置不合理、权责不分明，导致工作效率低下、企业积极性不高、社会缺乏活力，这严重阻碍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后，随着“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概念的提出，坚持以市场化为导向的改革思路更加坚定，转变政府职能成为当务之急，建立起有利于促进经济发展、有利于增强社会活力的政府职责体系和政府组织结构已刻不容缓。1988年，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了新一轮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明确提出要通过今后五年的改革，转变政府职能，精简政府机构，精简工作人员，提高行政效率，克服官僚主义。邓小平高度重视精简政府机构。他强调，“精简机构是一场革命”，“当然，这不是对人的革命，而是对体制的革命”<sup>②</sup>。精简机构是为转变政府职能服务。通过精简机构，裁撤一些专业经济管理部门，完善或新建一些综合和行业管理机构，减少专业部门对企业的干预，使政府对企业的管理逐步转向间接管理、宏观管理为主。除精简机构、转变职能外，为更好发挥政府职能、提高行政工作效能，邓小平还强调，要理顺中央同地方的关系，“真正建立从国务院到地方各级政府从上到下的强有力的工作系统”<sup>③</sup>，同时适合地方管理的权力逐步下放，增强地方治理能力。

## （三）动力特征：充分调动人民的积极性

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壮大根本动力，依靠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立足点。我国过去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民占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无论是改革开放前，还是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始终强调要调动农民的积极性，“要把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首先是把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sup>④</sup>，既要调动他们发展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又要调动他们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的积极性。工人阶级是先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代表，是中国共产党的阶级基础和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阶级。邓小平指出：“体制搞得合理，就可以调动积极性。”<sup>⑤</sup>他多次指出，要以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为突破口，以权力下放为抓手，充分调动工人阶级参与企业生产和参加民主管理的积极性，既搞活企业，提高劳动生产率，又切实维护工人阶级的利益，保证职工群众的主人翁地位。在我国，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是工人阶级中掌握科学文化知识较多的主要从事脑力劳动的那部分，是先进生产力的开拓者和教育科学文化事业的主要担当者。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必须充分依靠广大知识分子。邓小平强调，“一定要在党内造成一种空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sup>⑥</sup>要努力为他们创造良好的工作条件，关心他们的生活，提高他们的待遇，调动他们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积极性。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社会阶层构成逐渐发生新的变化，出现了新的社会阶层，包括个体户、私营企业主、自由职业者、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外资企业的技术管理人员等。这些新的社会阶层也得到了邓小平的肯定和支持，希望通过政策引导更好调动和发挥他们干事创业的积极性。

## 三、提出了推进中国特色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大要求

现代化的国家治理是在社会多元化和市场经济的基础上，以制度的现代化为具体依托，以服务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为指向的国家治理。<sup>⑦</sup>与传统管理相比，现代治理的进步性体现在：一是强调多元共治，即治理主体的多元性；二是强调规范治理，即治理方式的制度化、法治化。尽管邓小平没有明确使用过“国家治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概念，但是，他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回答中实际上已经蕴含着国家治理及其现代化的理念。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共产党迎来了其现代化观念的第二次转型，表现为围绕政治、文化等上层建筑议题扩充了现代化‘观念群’，并尝试摆脱西方的解释框架作出

①②③⑤⑥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28、396-397、339、54、41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27页。

⑦ 参见包心鉴：《国家治理现代化对执政党建设的新要求》，载于《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学报》2014年第5期。

本土性的现代化定义。”<sup>①</sup>

(一) 目标性要求：致力于建成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

国家治理要完成什么样的任务、实现什么样的目标，这是一个大问题，它管着许多小问题，规定并引领着治理的实践探索。对中国特色国家治理道路的前进方向和目标任务，邓小平明确指出，“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是我国人民肩负的伟大历史使命”<sup>②</sup>。目睹了近代西方列强侵略和封建王朝落后的中国人民，对现代化有着强烈的渴望。建国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农业、工业、国防、科学技术）的构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继续坚持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并强调是今后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党和国家的主要任务。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对现代化的认识发生了新的变化，从四个现代化发展为包括高度发达的生产力、高度民主、高度文明在内的多领域全方位现代化，强调“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才能更有效地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对付外国侵略者的侵略和颠覆，也才能比较有保证地逐步创造物质条件，向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前进”<sup>③</sup>。1987年党的十三大正式提出要“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为中国特色国家治理道路确立的长远目标和美好愿景，也事实上强调了中国特色国家治理就是要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奋斗。2017年党的十九大提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也是对邓小平确立的中国特色国家治理道路长远目标的接续发展。

(二) 内容性要求：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和定型的制度

推进中国特色国家治理现代化，内在的要求必须将探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和定型的制度作为重要内容。“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在总结经验教训的过程中，邓小平把重点放到制度建设这一问题上。他指出：“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sup>④</sup>此后，他又在多个场合强调，“制度是决定因素”<sup>⑤</sup>。制度可以规范和约束人的行为，完善的制度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重要体现和保障，也直接关系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大局。邓小平认为，制度的不完善是我国政治生活中存在的官僚主义、权力过分集中、家长制、特权现象产生的重要原因。如不认真进行改革，就很难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就会妨碍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在充分肯定制度重要性的基础上，邓小平又清醒认识到制度建设的长期性，“这个任务，我们这一代人也许不能全部完成，但是，至少我们有责任为它的完成奠定巩固的基础，确立正确的方向”<sup>⑥</sup>。南方谈话中，邓小平进一步提出了我国制度改革的时间表，“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sup>⑦</sup>。其中，“成熟”和“定型”是对制度建设质的要求，“三十年”是对制度建设量的要求。值得注意的是，2019年10月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决定》，“明确了三个时间节点：第一个时间节点，2021年，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第二个时间节点，2035年，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第三个时间节点，2049年，全面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sup>⑧</sup>。可见，邓小平关于制度建设的表述为《决定》提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目标、步骤提供了重要指导意义。

(三) 路径性要求：坚持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有机统一

探索中国特色国家治理道路是党领导下的人民事业，必须充分发扬人民民主，最大限度调动各方积极性。同时，民主与法制又是有机统一、相辅相成的。民主是法制的基础和灵魂，法制是民主的支撑和保障。过去一段时间内，由于缺乏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这一严重错误的发生。实践充分证明，要治理好社会主义中国，没有广泛的民主和健全的法制是不行的。民主是调动积极性的重要手段，法制是维护社会稳定的有力武器。“民主要坚持下去，法制要坚持下去。这好像两只手，任何一只手削弱都

① 洪讯：《中国共产党现代化观念的百年演进及其历史意义》，载于《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4期。

②③④⑤⑥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86、86、333、308、343页。

⑦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2页。

⑧ 唐鸣、杨婷：《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城乡一体化与“两委”组织法的修订》，载于《江汉论坛》2021年第6期。

不行。”<sup>①</sup>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社会主义民主与社会主义法制的有机统一。邓小平强调，发展社会主义民主，首先，要创造民主的条件，“在党内和人民内部的政治生活中，只能采取民主手段，不能采取压制、打击的手段”<sup>②</sup>，充分保障宪法和党章规定的公民权利、党员权利、党委委员的权利。其次，健全党和国家的民主集中制，“在党内生活和国家政治生活中，要真正实行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sup>③</sup>，把真实的民主和正确的集中结合起来，实现民主和集中有机融合、相得益彰。再次，“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sup>④</sup>，要集中力量制定各种必要的法律，“成熟一条就修改补充一条”<sup>⑤</sup>，逐步完善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体系；注重在人民中进行法制教育，增强法制观念，维护法律的神圣与权威；坚持严格按法律办事，任何人都不得干扰法律的实施，任何违反法律的行为都必须被追究。<sup>⑥</sup>

#### （四）保障性要求：重视干部队伍建设和人才培养选拔

治国之要，首要在人。改革完善党和国家的各项制度，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要有一支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具有专业知识和能力的干部队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非常重视干部队伍建设和人才培养选拔问题。他强调，正确的组织路线是正确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得以坚持和贯彻落实的保证和关键。只有真正重视干部队伍建设，培养选拔优秀人才，“四个现代化”才有希望。南方谈话中，他明确指出：“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sup>⑦</sup>。因此，领导干部的理想信念、素质能力和道德品质，关系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能否得到正确的实施。邓小平强调，“要善于发现、提拔以至大胆破格提拔中青年优秀干部”<sup>⑧</sup>，要注意德才兼备选干部，使干部队伍“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并且要把对于这种干部的提拔使用制度化”<sup>⑨</sup>。其中，“德才兼备”是选人用人的重要标准。“德”既包括“政治之德”，即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又包括“道德之德”，即良好的个人道德品质。“才”即有专业知识，懂专业技能。同时，对干部队伍中那些缺乏专业知识和专业能力的人，也要进行培训和指导，帮助他们掌握现代科学文化知识和管理经验，提高他们管理各方面事务的能力。<sup>⑩</sup>

## 四、推动了重塑中国特色国家治理体系的探索性改革

国家治理体系，即一个国家的制度体系，它是开展治理活动的依据。成熟完善的国家治理体系，可以最大限度的实现国家治理的效能。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为重塑国家治理体系，邓小平亲自领导了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党的制度建设等在内的全方位变革，推动中国特色国家治理体系从无到有，从不完善到逐步完善，并日益系统化、定型化，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and 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也为当前全面深化改革和推进国家治理奠定了物质基础，提供了理论准备，积累了实践经验。

#### （一）经济体制改革：探索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是邓小平思考最多的问题。要发展经济，就必须变革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我国体制机制的变革，首先是从经济领域开始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邓小平提出了三条原则：第一，解放思想；第二，因地制宜；第三，把促进生产力发展和人民收入增加作为压倒一切的标准。<sup>⑪</sup>这三条原则也为农村经济改革中探索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中坚持市场化取向奠定了思想基础。从1978年开始，四川、安徽一些地方的农民群众，大胆探索试行包产到户、包产到组等多种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取得了较好效果。1982年1月，中共中央批转的《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明确强调包括“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在内的各种责任制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并且“长期不变”。此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逐渐在全国各地推广开来。与此同时，中央大力推进一系列配套改革，解决了农村体制上的阻碍，解放了农村生产力，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推动了农村经济的发展，也增强了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

①②③④⑤⑧⑨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89、144、360、146、147、323、326页。

⑥⑩⑪ 参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2-360、326-361、312-314页。

⑦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0页。



人全面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心和信心。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加快推进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以增强企业活力,特别是国有大中型企业活力为中心环节,在计划体制、价格体系、政企职责分开、建立多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发展多种经济形式等方面进行一系列配套改革。同时,还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概念,这是我国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迈出的关键性一步。1992年,党的十四大正式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进一步勾画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把社会主义维护社会公平、促进共同富裕的优越性同市场经济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经济效率的长处结合起来,是我们党的一个重大制度创新,为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经济治理体系明确了基本方向,提供了基本遵循。经过长期的艰苦努力,2000年,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郑重宣布,我国已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 (二) 政治体制改革:走出中国特色民主政治发展道路

同经济体制改革一样,政治体制改革也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解放思想的潮流中开始起步的。邓小平明确指出,改革不仅是经济体制方面,必然还包括政治体制改革。他强调,要通过政治体制改革发展民主、健全法制,形成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没有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搞四个现代化就不行”<sup>①</sup>。这是邓小平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惨痛经历得出的深刻教训,也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议题和主要内容。1980年,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中,进一步对我国现行政治体制中存在的种种弊端进行了深刻分析,并指明了改革的方向和方法。此后,邓小平又在多个场合反复提及政治体制改革问题。党的十二大以后,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政治体制改革的紧迫性更加突显。邓小平指出,“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sup>②</sup>着眼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和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发展,经过系统探索,邓小平对政治体制改革“改什么、怎么改、要实现什么样的目标”都作了明确回答。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包括进一步下放权力,精简机构,克服官僚主义;改革干部人事制度,提高活力和效率;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等。在具体的方式方法上,第一,立足基本国情,走自己的路;第二,以政治稳定和社会安定为前提;第三,渐进式改革,分步骤、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第四,与经济体制改革相互配合、相互促进。改革的目标是建立高度民主和法制、富有效率与活力、充分调动积极性和创造性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发展社会生产力,巩固社会主义制度。<sup>③</sup>邓小平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这些设想,被充分吸收写入了党的十三大报告,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实践指南。此后党和政府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发展道路。

### (三) 党的制度建设:有力保障了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

制度具有管根本、管全局、管长远的作用。对执政党建设来说,同样如此。加强党的制度建设,对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对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对确保党和国家长治久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中,邓小平对党的制度建设的现状进行了分析,认为现行的一些具体制度中还存在不少的弊端,同时制度有缺位。因此,为了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有序化、民主化,促进全面发展和长治久安,必须加紧完善党的制度建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邓小平执政党建设理论的指导下和其本人的亲自参与下,党中央在健全和完善党的制度建设方面开展了一系列富有成效的工作。第一,健全以党章为核心的党内法规体系,先后制定出台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等重要法规,并于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章程》,为党内生活的民主化和党的建设的制度化提供了基本遵循和重要保障。第二,改革完善党的领导制度,健全完善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第三,完善民主集中制的具体制度,包括坚持和完善党的代表大会制度,改革和完善党内选举制度、党的组织生活制度等。第四,废除实际存在的党内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实行离退休制度。第五,完善党内监督制度,逐步健全强有力的监督体系。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89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6页。

③ 参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6-252页。

总之，自20世纪70年代末始，邓小平带领党和人民以解放思想为突破口，以我国的基本国情为立足点，以改革开放和体制机制变革为抓手，成功开辟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道路。其为探索中国特色国家治理道路确立的方法论原则、奠定的本土化模式、明确的重大要求、所作的探索性改革等均具有重要指导和启示意义。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邓小平同志留给我们的最重要的思想和政治遗产，就是他带领党和人民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他创立的邓小平理论。”<sup>①</sup>40多年来，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沿着这条道路继续前进，并根据变化了的环境和条件不断拓展深化。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确定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并明确提出了建设的时间表。<sup>②</sup>40多年来，正是因为始终坚持并不断拓展这条正确的道路，社会主义中国才能创造出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中华民族才迎来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和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当前，“邓小平同志为我们擘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蓝图正在一步步变成美好现实”<sup>③</sup>。未来，“只要我们沿着这条道路继续前进，就一定能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sup>④</sup>，就一定能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责任编辑 周华平]

### Deng Xiaoping's Historic Contribution to the Road of National Governanc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Liang Dongxing Ma Bo

**Abstract:** Si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especially after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has led the people into forging a path of national governanc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rough unremitting efforts. As the chief designer of reform and opening-up as well as the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Deng Xiaoping has established the methodological principles for exploring the path of national governanc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which has laid the localized model of the path of national governanc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put forward major requirements for advanc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national governanc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Besides, he has promoted the exploratory reform of reshaping the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made historic contributions to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road of national governance path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Key words:** Deng Xiaoping; the Path of National Governanc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Governance Modernization ;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①③ 习近平：《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08月21日。

②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页。

④ 《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七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继续沿着党和人民开辟的正确道路前进 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人民日报》，2019年09月25日。